

明清史散论

王春瑜 / 著



商務印書館
The Commercial Press

明清史散论

王春瑜 著

 商务印书馆
The Commercial Press

2015年·北京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明清史散论 / 王春瑜著. — 北京: 商务印书馆,
2015

ISBN 978 - 7 - 100 - 11631 - 2

I. ①明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中国历史—明清时代—
文集 IV. ①K248.07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237601号

所有权利保留。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。

明清史散论

王春瑜 著

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
(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)

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
三 河 市 尚 艺 印 装 有 限 公 司 印 刷
ISBN 978 - 7 - 100 - 11631 - 2

2015年11月第1版 开本 640×960 1/16
2015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20

定价: 60.00 元

序

谢国桢前辈晚年常感叹“垂老无成”，在回忆其恩师梁任公文中更说“愧然白头老门生”。岁月不居，我也到了古稀之年，比起明清史大家谢国桢先生那一辈学人，不才如我，借友人王曾瑜先生的话来说，实在是“先天不足，后天失调”，差距很大。“四人帮”粉碎后，虽然我在史学园地努力笔耕，但成绩不大。何况我文史两栖，“三心二意”，并未将全部精力用于史学研究。

从初夏一直忙到孟秋，我才将《明清史散论》及另外两本书重新审改一遍。坡翁有词云“莫听穿林打叶声，何妨吟啸且徐行”。我与吟啸无缘，还是继续在史学园地老实耕耘吧！

王春瑜

2015年9月24日上午再改定

目录

CONTENTS



顾炎武北上抗清说考辨 (1962)	/ 1
明末农战史杂识 (1978)	/ 26
李自成、崇祯帝“和议”初探 (1979)	/ 41
论曹寅在江南的历史作用 (1979)	/ 50
略论八旗子弟 (1979)	/ 66
论“四权”与明末农民战争的关系 (1980)	/ 75
论朱升 (1980)	/ 90
李定国与云南少数民族 (1981)	/ 103
论明末农民战争与清初反君权思潮 (1982)	/ 112
施让地券及《云卿诗稿》考索 (1982)	/ 123
《明代江南农业经济》提纲	/ 134
1982年明史研究概述	/ 140

明代宦官与江南经济 (1984)	/ 152
论明代江南园林 (1987)	/ 169
“弃物”论——谈明代宗藩 (1988)	/ 187
明代流氓及流氓意识 (1989)	/ 199
明代宦官与故宫 (1990)	/ 208
明代商业文化初探 (1992)	/ 218
李自成死事考辨 (1999)	/ 243
明人文集的人文传统 (2000)	/ 273
甲申三百六十周年祭 (2004)	/ 288
从郑和“七下西洋”看中国的海权体系 (2005)	/ 294
明代山人面面观 (2007)	/ 301
《明清史料丁编》序	/ 308
后 记	/ 311

顾炎武北上抗清说考辨（1962）

顺治十四年（1657，是年顾炎武 45 岁）后的一段时期，是顾炎武一生政治活动、学术活动的重要时期。从这一年起，他过江北上，此后 25 年的漫长岁月，都是在北方度过的。顾炎武为什么要到北方去？他在北方 25 年的后半生中，究竟干了些什么？对当时的社会现实产生过什么影响？应该如何看待前人对顾炎武的评述？在本文中，笔者试图对这些问题做一番较为深入的探讨，以期对顾炎武后期的政治倾向做出实事求是的评价。

1657 年，顾炎武过江北上。顾炎武为什么要到北方去？他在北方究竟干了些什么？对这个问题，梁启超曾经困惑地说：“他虽南人，下半世却全送在北方，到死也不肯回家。……为何举动反常到如此田地？这个哑谜，只好让天下万世有心人胡猜罢了。”^①当代许多史家认为，这表明顾炎武是为了“密察山川形势，阴结豪杰之士”，从事“抗清统治的秘密活动”。^②笔者认为，这种说法是与历史实际不相符合的。

① 梁启超：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》，上海民志书店 1929 年版，第 85—86 页。

② 《顾亭林学谱》、《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》、《顾亭林诗文集·出版说明》、《爱国学者顾炎武》、《中国简明思想史》、《清诗纪事初编》等书，基本上均持此说。

1645年春天，昆山县令杨永言曾推荐顾炎武到南京去担任弘光小朝廷的兵部司务。但这年四月底，顾炎武到达南京后，还不到十天，清兵已于五月九日渡江，次日夜弘光帝仓皇出走。五天后清兵进驻南京，弘光小朝廷便正式瓦解了。接着，他便回到昆山来，参与组织抗清武装斗争。与南明小朝廷的亲身接触，不能不使他深切感到，南明小朝廷在政治混浊、不得民心方面，较诸崇祯朝廷有过之而无不及，其抗清活动是不可能有什么前途的。昆山等地武装斗争的失败，更加深了他这种认识。因此，1645年秋天，当福州唐王朱聿键受人推荐，授予他兵部职方司，并在次年春天特派了使者秘密至昆山请他赴任时，他却推故拒绝，事后只写了一首诗“但志其感而已”。^①显然，顾炎武根本打算将自己的命运与注定要短祚的唐王的命运连在一起。如果按照许多史家所说那样，顾炎武始终是积极从事反清复明活动的，那么他为什么拒绝唐王的授职，不去海上，也不向南走去支持永历抗清政权，反而匹马单枪，向清政府的腹地北方走去呢？这是无法求得通解的。

其实，顾炎武所以要跑到北方去，是深有苦衷、迫不得已的。自清兵过江南下后，江南的社会关系发生很大震动。一方面，由于明末李自成、张献忠的革命矛头都没有伸到苏南地区，所以这里的阶级关系未能通过革命的暴力获得调整。因此，当清兵南下后，许多地区农民群众，趁新旧王朝交替，地主阶级统治秩序大遭破坏之机，掀起了打击豪绅、夺粮抗租的阶级斗争。在太湖、泖湖等地区，农民运动风起云涌。^②另一方面，在地主阶级内部，也展开了激烈的火并。降清派地主往往抓住抗清派地主一些曾经参与抗清运动的把柄，借机挟诈，以兼并土地，勒索财富。如吴县的张明勋，由于“性素耿介，晚节犹

① 吴映奎：《亭林遗书·顾先生年谱》；张穆：《顾亭林先生年谱》，丛书集成本，第19页。

② 董含：《三冈识略》卷18；褚人获：《坚瓠补集》卷1。

碌碌自爱”，不愿与清朝合作，结果就“屡遭外侮，家产渐中落”。^①一些豪奴恶客，也见风使舵，背弃原主，重新投靠降清派地主。他们“结党成群，以索券为名，焚掠无虚”^②，打击抗清派的旧主子。在这种混乱局面中，顾炎武也身受其害。昆山顾家，原是大地主，在明清之际，与叶、徐、李、王四姓，并称为“昆山巨族”。^③顾炎武家原有地800亩，后来以良田数顷，向里人叶方恒^④押银。至顾炎武时，急欲赎回，而叶家意图吞没，恣意延搁，顾炎武追索不已，叶家遂以千金收买顾炎武的世仆陆恩，唆使他告讦顾炎武通海，力图使顾炎武畏罪逃逸，不敢再提田事。顾炎武怒杀陆恩，叶家又进一步告他无辜杀奴，重贿松江太守，将他逮捕入狱。后来，幸得其好友归庄等人的大力营救，特别是通过清朝新贵钱谦益的调解，才获释。但叶家并不就此甘心，又密派刺客暗杀顾炎武，顾炎武避至南京，刺客追至太平门外，击伤其首，几遭不测。同时，又纠合了数十名恶棍，将顾炎武家中抢劫一空，“尽其累世之传以去”^⑤，给他以沉重的打击。

不仅如此，顾炎武的族人与亲友，这时也深恐他曾经与南明小朝廷有过往来，参加过昆山抗清斗争，一旦兴起大狱，势必祸及自己。因此，都要他及早离乡背井，远走避祸。正是在这种无可奈何的情况下，顾炎武不得不感慨道“奴隶鸱张，亲朋澜倒”^⑥，“出门多蛇虎”^⑦，为了“毋为小人资，委肉投饿虎”^⑧——亦即被叶方恒之流降清派地主勾结清政府所暗害，才谨存“戒心，乃浩然有山东之行”^⑨。他的

① 汪琬：《尧峰文钞》卷17《张府君墓志铭》。

② 陆珑其：《三鱼堂文集》卷11。

③ 王应奎：《柳南随笔》卷6。

④ 叶氏原为崇祯壬午举人，明亡降清，中顺治初年进士，任济宁道金事等官。

⑤ 归庄：《归庄集》卷3《送顾宁人北游序》。

⑥ 顾炎武：《顾亭林诗文集·亭林文集》卷4《答原一公肃两甥书》。

⑦ 顾炎武：《顾亭林诗文集·亭林诗集》卷2《将远行作》。

⑧ 顾炎武：《顾亭林诗文集·亭林诗集》卷2《流转》。

⑨ 顾炎武：《顾亭林诗文集·亭林诗集》卷2《赠路光禄太平》。

好友归庄，也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：“宁人度与公子讼，力不胜，则浩然有远行。”^①

顾炎武觉得到北方去比较安全，这是因为，清政府对流寓北方的江南士子，一般是比较优容的。他们一旦离开了原地区，政治上的影响便大为削弱，特别是使清政府深恶痛绝的江南富有传统性的知识分子群众运动——党社活动，再也搞不起来。所以，即使他们在北方拒不出仕，清政府也很少干涉，因为这毕竟比留在南方是后退了一步。如彭孙贻就是个很典型的例子。他的父亲明太仆彭期生，以及两个弟弟麀孙、子羽，都在明亡时抗清殉国。他曾冒着生命危险，亲至江西，寻求先父遗骨。^②归家后，“二十余年……不交人事”，不愿与清朝合作。清统治者对他“吹索百端”，肆行迫害。后来，他在京师的朋友写信给他：“曷远游以释疑乎？”彭孙贻遂“轻装北上，巡览名胜，凭吊陵寝，作诗数百篇”^③，从此安然无恙。甚至即使北方的士子受到迫害，只要他们远走异乡，也可以免祸。如徐州的阎尔梅，明季曾做史可法幕僚，清初又与山东曹州榆园抗清军有过往来，居常更恃才傲物，夙励名节，所以在家乡累遭名捕，妻妾均坠楼而死。“值患难相寻，遂远游十岳，凡三十年乃归。”^④因此，清初南方一些具有民族气节，受地方降清派地主与清政府迫害的知识分子，经常离开故土，远走北方，以脱离江南这块是非之地。顾炎武正是这些人当中的一个。

由此可见，顾炎武的北上远游，实际上是避祸保身的消极行动，而不是像某些史家所说那样，旨在进一步积极策划抗清活动。

顾炎武在北方究竟干了些什么？一些说他在从事秘密策划抗清活动的史家们，其主要论据，不外这几点：

① 归庄：《归庄集》卷3《送顾宁人北游序》。

② 谢国桢：《明清笔记丛谈》，中华书局1960年版，第257页。

③ 同上书，第255—256页。

④ 阎尔梅：《徐州二遗民集》卷7《白登山人集》。

（1）顾炎武在北方结交了很多朋友，他们是“形形色色”的“神秘人物”，顾炎武曾与他们共同策划反清复明。

（2）康熙七年（1668）顾炎武曾经在山东被捕入狱，可见他是在从事抗清活动，否则他怎么会与“黄培诗案”联在一起，身陷囹圄呢？

（3）顾炎武在《与三侄书》中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：“秦人慕经学，重处士，持清议，实与他省不同。……华阴绾毂关、河之口，虽不出户，而能见天下之人，闻天下之事。一旦有警，入山守险，不过十里之遥；若志在四方，则一出关门，亦有建瓴之便。”^①而顾炎武后来更定居在陕西。这表明他是将希望寄托秦人，以陕西作为反清复明的基地。

（4）顾炎武在北方曾“广置田产”，从事过垦荒，这显然是表明顾炎武为抗清活动“建立经济基础”，“替恢复运动建立根据地”。

笔者认为，这四条论据都难以成立。现在本文就来逐条讨论一下。

首先，来看一看，顾炎武在北方所交的那些朋友究竟是些什么人，他们在明亡后是否从事过反清活动。

顾炎武在北方交结的朋友确实不少，但关系比较密切的，是万寿祺、申涵光、张尔岐、程先贞、阎若璩、傅青主、李因笃、王宏撰等人。限于篇幅，本文想举出其中几个人为例，来重点考察一下他们的行动。

万寿祺，字年少，徐州人。他原是崇祯庚午举人，明亡后，起初在山阳浦西隐居，后来则悲观厌世，“每念生无益于世，后且与草木同腐朽”，遂削发为僧，自谓“脱去世谛，人我两忘”。^②显然，这种隐避逃禅与世无争的颓废态度，尽管客观上也许不无略含抵制清朝的意义，但对待现实竟消极到这种地步，是绝不可能冒生命危险，去积极从事

① 顾炎武：《顾亭林诗文集·亭林文集》卷4《与三侄书》。

② 万寿祺：《徐州二遗民集》卷3《隔西草堂文集·自赞》。

所谓秘密抗清活动的。

申涵光，字鳧盟，永年人。明太仆申佳胤之长子。明亡后，开始尚乡居力耕，抵制清朝，但时过境迁，渐更初衷。他深深感到，明朝是一去不复返了。在《览镜》一诗中，写尽了这种胸怀：“览镜发惊白，浮生亦可怜。儿童犹昨日，心事已衰年。自笑谋生拙，人讥闭户偏。驻颜岂有术，怀古愧徒然。”^①从此抱定主意，“随便安分，便是安乐法”^②，成了十足的与世无争者。后来更公开宣扬与清朝合用：“官粮必早输纳，每岁收入先除此一项，余者乃以他用。”^③实质上即劝人们做清朝的恭顺臣民，不要起来反抗。像这样的人，怎么可能会与顾炎武一起，去从事所谓抗清活动？

阎若璩，字百诗，号潜丘。先世太原人，移居山阳。此公品节，颇不足取。康熙十八年（1679），他参加博学鸿词科考试，未被录取。后来投靠徐乾学，收其弟徐元文为弟子^④，予修清一统志。徐乾学死后，他哀叹“穷老不遇”，写了《吞声》、《残年哭知己》等诗，如丧考妣。^⑤后来胤禔写信给他，召他赴京，他已年近古稀，且正卧病在床，竟“霍然而起”，奔赴京中，力图飞黄腾达，结果到京后便病死。显然，醉心于爵禄，一点民族气节都没有的阎若璩，如果说他曾与顾炎武秘密抗清，即使验诸常理，也断不相容。

李因笃，字天生，一字子德，陕西富平人。其父李映林，曾加入复社。起初，李因笃尚能保持民族气节，拒不出仕，自称中南山人。但后来也没有经得起时间的考验。康熙十八年（1679），他不听顾炎武“以不预考为上上，至嘱至嘱”^⑥的劝告，与潘耒、严绳孙、朱彝尊等

① 申涵光：《聪山诗选》卷3《览镜》。

② 申涵光：《荆园小语》。

③ 同上。

④ 徐元文：《含经堂集》卷24《太原阎先生寿序》。

⑤ 张穆：《阎潜丘先生年谱》卷3。

⑥ 顾炎武：《顾亭林诗文集·蒋山佣残稿》卷3《答李子德》。

人，以布衣应试博学鸿词科，中一等第七名，授官检讨。^①他不仅自己应试，而且还力劝李颀，“誅之以利害”，要他出仕，以致顾炎武不得不很愤慨地对他说：“窃谓足下身蹶青云，当为保全故交之计；而必援之使同乎己，非败其晚节，则必夭其天年矣！”^②虽然，李因笃后来给康熙皇帝上了一道密疏，获得康熙的特别许可，辞官回家。但我们从他的为人中，可以清楚地看出他绝不是胸怀异志，能够冒险去从事秘密抗清活动的人。

通过上述对顾炎武在北方几个重要朋友的剖析表明，与某些史家们所说相反，这些人既非“形形色色”，更不“神秘”。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，都是明代遗臣或士大夫的后裔，与东林复社有过关系，明亡后曾采取过与清朝不合作的态度，以消极抵抗，因而在政治态度上，有与顾炎武相通之处。更重要的是，他们都是清初大儒，精通经史，在地方上威望颇重，与他们在一起，对自己的学术活动颇有裨益。正是基于这种关系，顾炎武才与他们优游交往。而从总的政治倾向来看，这些人后来不是消极厌世，遁迹山林，就是投靠清朝，一改起初的抵制态度而重新合作。他们的这种态度，正是清初抗清派地主与降清派地主之间，由矛盾斗争到日趋合流的历史进程的标志。如果把这些人虚构成“形形色色”的“神秘人物”，说他们曾与顾炎武一起共图反清复明的大业，与这些人本身的事实根本不相符合。

其次，1668年顾炎武在山东入狱，究竟是怎么回事？《山东省志资料》（1962年第2期）曾刊出周至元的《清初即墨黄培文字狱资料》，对这次狱案提供了丰富的材料。^③这次案件，是原即墨明代遗臣黄培家奴、清朝新贵姜元衡，看中黄培具有一定的民族思想、节操，不仕清朝，在诗句中流露出种种不满现实的情绪，借机向黄培敲诈重金未

① 李因笃：《受祺堂诗集·潘未序》。

② 顾炎武：《顾亭林诗文集·蒋山佣残稿》卷2《答李子德》。

③ 这篇资料亦间有失实之处：如将营救炎武之徐元文，误作徐乾学等。

遂，反而遭到黄培对他人格上的侮辱，因而愤予报复，纠合了一些平素与黄家有仇的人，以及地方上的讼棍，捏造了许多黄培通海、反清等罪状，勾结清朝官吏，将他逮捕入狱。事隔经年，黄、姜二家互相攻讦，案件波及面越来越大，牵连到300余人。姜元衡为了打赢这场官司，将黄培置于死地，陆续增补了一些捏造的罪状。这时，章丘谢长吉，他曾因欠顾炎武大宗银两，将庄田十顷抵押，今见济南兴起大狱，遂趁机陷害顾炎武，企图夺回田产。他与姜元衡串通，诬指陈济生所辑《忠义录》是顾炎武所作，并说他与黄培暗通声气，秘密反清。这样，顾炎武便无端牵连到黄培诗狱的案子上来。顾炎武在《与人书》中说：“无缘奉复，弟旋有意外之事。衅起于章丘，祸成于即墨，遂以三千里外素不识面之人，而请旨逮问。”^①事情的真相十分清楚。对这种诬告，顾炎武并无畏怯，他深知如果远身逃走，反而引起嫌疑，因此认为“去矣足自全”^②，要他的叔父“暨诸亲长，不必过虑”^③，自动到济南投案。他这种明智的行动，其亲友都十分赞佩，如归庄说：“闻兄以山左荐绅相仇之事连及……深叹兄之善处忧患。张元节之亡命，虽幸免祸，君子讥之；乃兄自诣狱，不惟举动光明，揆之事理，亦自宜尔。盖两姓交恶而委罪于兄，兄身出则事白，事白则身全。兄之慷慨就狱，乃精于脱祸者也。”^④从归庄这段颇为典型的议论里，可以进一步看清顾炎武这次入狱的真相。

顾炎武的这次入狱，由于根本出于陷害，没有任何根据，加上其亲友徐元文、李因笃、朱彝尊等人的营救，所以不出顾炎武所料，很快就将他释放了。因此，某些史家拿这件事作为顾炎武在北方从事所谓秘密抗清活动的证据，无法成立。

① 顾炎武：《顾亭林诗文集·蒋山佣残稿》卷2《与原一甥》；张穆：《顾亭林先生年谱》卷2。

② 顾炎武：《顾亭林诗文集·亭林诗集》卷4《赴东六首》。

③ 顾炎武：《顾亭林诗文集·蒋山佣残稿》卷2《上国馨叔》。

④ 归庄：《归庄集》卷5《与顾宁人》。

再次，对顾炎武在《与三侄书》中对陕西关中形势的一段议论，应该怎样理解？

笔者认为，他的前几句话，即“秦人慕经学，重处士，持清议，实与他省不同”，只是一般地谈论陕西学风、政风而已。顾炎武虽然生长江南，但他对南方的学风是颇为不满的，他把南方王学末流的泛滥、门户林立的党社、士大夫的临危变节，视作明代痼疾之一，曾屡加抨击。如谓：“江南之士，轻薄奢淫，梁、陈诸帝之遗风也。”“群居终日，言不及义，好行小慧，难矣哉，今日南方学者是也。”^①“自余所及见，里中二三十年来号为文人者，无不以浮名苟得为务。”^②在《与王山史》书中，也说：“小儿衍生虽极鲁钝，尚未有南方骄慢习气。”^③而他对北方的学风虽然有时亦予批评，但较诸南方，更多的是钦佩与赞扬。上述谓“秦人慕经学、重处士”云云，正是这种随意表述之一，并无特殊政治含义。不应该孤立地抓住这几句话，妄加猜测。

至于后一段话，即“华阴绾毂关、河之口，虽足不出户，而能见天下之人，闻天下之事。一旦有警，入山守险，不过十里之遥；若志在四方，则一出关门，亦有建瓴之便”。笔者认为，这也不过是顾炎武谈论地理形势的一般议论。清初士大夫，他们受明末农民战争及清军入关的刺激，在探讨明代失败教训时，地理形势的得失，成了讨论的中心问题之一。如黄宗羲就曾经专门讨论国都定于南京、北京的利害得失，说明朝“亡之道不一，而建都失算，所以不可救也”^④，他认为如果明朝一直都于南京，局势将有所不同。侯朝宗在晚明写了《定鼎说》，清初出版自己的文集时，特将此文收入，鼓吹咸阳一带“山河四塞，崤函重关，后有巴蜀之饶，前有商邱之阻，故兵戎出于不意，可

① 顾炎武：《日知录》卷13“南北学者之病”条。

② 顾炎武：《顾亭林诗文集·亭林文集》卷5《吴同初行状》。

③ 顾炎武：《顾亭林诗文集·蒋山佣残稿》卷2《与王山史》。

④ 黄宗羲：《明夷待访录·建都》。

以退安而徐复”。朝宗的友人吹捧此文说：“此说作于戊寅，十五年前即已见及迁都矣。”^①陆世仪则谓：“善治天下者，必使天下之全势了然在目。”^②强调把握地理形势的重要。在这种思潮影响下，顾炎武十分重视对地理形势的研究。其所著凡100卷的《肇域志》及120卷的《天下郡国利病书》，写作时都是别有怀抱的。他还专门写了一篇《形势论》纵谈天下形势，探讨历代建都得失。即使在他的一般著作中，剖析地理形势的议论，也是屡见不鲜。

此外，顾炎武所讲关中形势的一段话，非其独创，在前人，几乎成了口头禅。如秦楚相争时，韩信曾对项羽说过：“关中阻山带河。四塞之地，地肥饶，可以都霸。”汉初刘邦亦谓：“秦地被山带河，四塞为固，卒然有警，百万之众可立具。入关而都之，此搯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。”^③这种议论，简直不胜枚举。即使与顾炎武同时的人，他们言及此地形势，也是如出一辙。如王宏撰谓：“关中为天下首，而潼关以临中原，实扼其吭，具建瓴之势。”^④显然，顾炎武讲关中形势的一段话，只不过是历来传统议论的随便复述而已，根本谈不上具有什么特殊政治意义，以顾炎武的这段议论，来说明他旨在把陕西作为反清复明的基地，未免失之牵强。

那么，为什么顾炎武晚年却偏偏定居在陕西呢？

笔者认为，其根本原因是由于陕西是明末农民大起义的发祥地，明末，这里成为各种矛盾的焦点，阶级斗争特别尖锐，经过明末农民革命的洪流洗刷后，这里阶级关系调整的幅度比其他地区要大得多，因此社会秩序比较稳定。这里没有像江南“奏销案”、科场狱那样对士大夫进行经济、政治的严重打击与迫害。而且陕西的物价，又比江南便宜得多。顾炎武在写给其外甥的信中，曾经说：“吾今居关、

① 侯朝宗：《壮悔堂文集》卷9《定鼎说》。

② 陆世仪：《陆桴亭文集》卷6。

③ 顾祖禹：《读史方舆纪要》卷53，中华书局1957年版，第2300—2301页。

④ 王宏撰：《砥斋集》卷12。

华，每年日用费约百金，若至吴门，便须五倍。”^①此外，陕西是古代先民发迹之地，周丰镐、秦成阳、唐长安等遗迹均在于斯，清初一些明代遗老，往往跑到这里来低回凭吊，发泄他们缅怀故国的思古幽情。如屈大均就曾经足迹遍陕西，登上雁门关，写下了“雁门北接尝山路，尔去登临胜概多”^②的苍凉字句。阎尔梅更浪迹关山，到处吟诗，对“鹦鹉谷荒兰殿夜，麒麟阁毁柞宫秋”^③，发出无穷的慨叹。顾炎武更是如此。他与王宏撰等人经常“优游山水间”^④，“相与读残碑，含愁吊今古”^⑤。正是由于这些原因，再加上他对江南的学风一贯不满，与叶家之仇不共戴天，所以顾炎武对陕西的环境颇为满意。每对亲朋谓：“此中山水绝佳，同志之侣多欲相留避世”^⑥，抱定主意，“从今世事无烦问，但掩衡门学种蔬”^⑦，在这里著书名山，终其天年了。

最后，本文再来看一看，顾炎武在北方的田产、垦荒，实际情况究竟怎样。

与某些史家所渲染的所谓“广置田产”，甚至像梁启超所说顾炎武“每到一地，他认为有注意价值者，便在那里垦田”^⑧相反，顾炎武在北方的田产，有文献可考的虽有三处，而稍有影响的，实际上只有山东章丘大桑家庄那一处。^⑨此处田产，并非顾炎武特意购置，而是因

① 顾炎武：《顾亭林诗文集·亭林文集》卷3《答原一公肃两甥书》。

② 屈大均：《屈翁山诗》卷5。

③ 阎尔梅：《徐州二遗民集》卷7《白登山人集·关中杂咏》。

④ 王弘撰：《砥斋集》卷8。

⑤ 顾炎武：《顾亭林诗文集·亭林诗集》卷5《与胡处士庭访北齐碑》。

⑥ 顾炎武：《顾亭林诗文集·亭林文集》卷3《与李星来书》。

⑦ 顾炎武：《顾亭林诗文集·亭林诗集》卷2《酬陈生芳绩》。

⑧ 梁启超：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》，第85页。

⑨ 另两处，一在山东汶阳，一在华阴。前者见于《顾亭林诗文集·亭林佚文辑补·与颜修来书》：“汶阳归我，治之四年，始得皆为良田。今将觅主售之……为入山读书之计”。后者见于《顾亭林诗文集·亭林文集》卷4《与三侄书》：“新正已移至华下祠堂……吾亦须自买堡中书室一所，水田四五十亩，为饔飧之计”。两处田产，虽无法考其详情，然从亭林语中，显见此两处田产规模既微，犹无特殊动机。